

提高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

王绍祯

以百姓之心为心

李华北

习近平同志在 2015 新年贺词中说：“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。”他还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5 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《道德经》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的话。习近平同志的这些讲话，充满了浓厚的为民之情、亲民之心，大振党心、深得民心。

老子说：“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”。古人云：“政之所兴在顺民，政之所废在逆民”“凡举事必先审民心，然后可举”。民情有实际的情况，民意有急迫的要求，民生有政治反映，民心有执政力量。所以，“百姓与之则兴，百姓非之则危，百姓恃之则亡”。在古代，孟老夫子有“民为贵、社稷次之、君为轻”“以民之所利而利”的政治主张；西汉贾谊有“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本也”的论述；清朝郑板桥有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”的诗句。总之一句话：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民心不摇邦自固，得“口碑”者得“丰碑”。

“以百姓之心为心，”在今天，它体现了共产党人关注民生、以人为本的理念，是当官从政者的做人之道，治党之

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、血脉在人民、力量在人民。“意莫高于爱民，行莫厚于乐民”。实践证明，共产党人正是做到了牢记党的宗旨，事事处处把人民放在心上，才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，我们的事业才蓬勃发展。

本，兴国之基，执政之要。有位哲人说过，“民心是一种最简单而又是最真挚的财富”。对执政的共产党人而言，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，体现着共产党人“以人为本、执政为民”的理念，同时，又是制定党的方针、政策、路线的依据和检验党的方针、政策、路线是否正确的“试金石”。总之，这是我们党取得一切胜利之本、之策、之源。

在党的历史上，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躬行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的民本观念的价值取向。毛泽东指出：“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，凡属正确的领导，必须是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。”坚持群众路线，坚持办事先听取群众意见，一切按群众的意愿办事，这是我们党做好各项工作、战胜任何困难的一大法宝。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，特别注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，特别注重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，明确提出要把人民“拥护不拥护、赞成不赞成、高兴不高兴、答应不答应”作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，每逢重大决策和重大事宜，总要召开各种形式的座

密无间，而是不可一世，瞧不起群众，压制群众；不是深入群众，拜群众为师，甘当小学生，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，而是欺上瞒下、沽名钓誉；不是放下架子，去掉官腔，善于从群众中学知识、长才干，而是唯我独尊、颐指气使、作风浮躁；不是依靠群众，以群力、群策、群计、群智，科学决策，而是自以为是、盲目决策、劳民伤财。这种傲慢群众、轻视群众、脱离群众、违背群众的表现、行为，则是非常有害的。天下大势，系乎民心；民心所向，天下归之；党群同欲，天下无敌。所以，共产党人要深扎“以百姓之心为心”之根，心为民、行为公、干实事、立新功。

古人云：“利在一己勿谋，利在天下则谋；利在一时勿谋，利在万世则谋。”“为一身谋则愚，而为天下谋则智”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。真正做到“以百姓之心为心，”就要一个心眼为党、为国、为民，不图私、不图利、不图名；必须常修从政之德，常思贪欲之害，常怀律己之心；永记为民之责、深怀爱民之心、善谋安民之道、多办利民之事；要始终把党的信念作为“第一追求”、把服务群众作为“第一职责”、把群众富裕作为“第一目标”、把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“第一尺度”，把一心为民作为“第一要求”；工作中，民有所呼、我有所应，民有所需、我有所为，民有所难、我有所帮，民有所急、我有所助。真正让人民群众处处欢心、舒心、开心、称心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。

(作者单位：西华县公安局医院)



新形势下做好安全监管工作之我见

段学星

真落实两个主体责任。同时，意识要超前，要打破常规，超前思维，尽早谋划，提前出击，围绕工作重点思考问题，围绕工作重点研究问题，用“放大镜”查隐患，有事故苗头立即开展工作，有事故隐患就及时治理，在把握安全生产全局的前提下找准工作重点，统筹安排部署，集中治理隐患，用全局的观念做好安全生产各方面的工作。

要强化责任。安全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基础，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石，只有心里有了责任感，才能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，才能勇于担当安全生产工作重任；只有强化红线意识，增强责任感，才能从思想上重视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。心里装着责任，就会以安监工作为己任，主动深入一线，搞好监管和督查，了解实情，去破解安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；就会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使命，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科学的方法去做好安监工作。

要把握大局。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长期性、艰巨性和特殊性的特点。工作中，要把握大局，履行好统筹协调职能和牵头组织的作用，督促政府部门和企业认

有人说，明太祖在中国历史上是深受文牍主义之苦的人，这是言之有据的。据《明太祖实录》记载，洪武十七年（公元1384年）9月间的8天内，他共收到内诸侯奏札1660件，平均每天要看或者听两百多件报告。有一回，刑部主事茹太素写了17000字的意见书，明太祖叫人读给他听。读了6370字还听不出个头绪，明太祖一气之下把茹太素打了一顿。第二天晚上接着读，一直读到16500字以后才讲到本题，要讲的5件事情总共才500来字。

当了皇帝居然还要受文牍主义的压迫，这使明太祖很苦恼。逼得他不得不采取一点措施，来整饬文牍之风。他亲自规定了建言格式，写了《建言格式序》，公布全国。当然，文牍主义是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，不是任何人所能反对得掉的，但是明太祖的这番用心还是值得称道的。

想不到发生在大约600多年前的明太祖的苦恼，今天依然困扰着许多人。最近，看了几篇报道就透露了这样的情况。

在某局，仅一个月时间，上级机关就要报送达107份之多。某委一个打字员一年打印了800多份文件、材料……有410份是上报的。

数以千计的文件都是领导机关要的或发的。那些撰写和收发文件的人为此而辛辛苦苦。那么看文件的人苦不苦呢？前几天，我到某领导机关开座谈会，一位领导同志也来参加。他的开场白刚过，秘书就取文件来了；讲了几句话，呈阅件又送来了……就这样，在3个多小时里，秘书频频送来，文件往返传递，一面听汇报，一面为批阅繁杂的文件忙得不可开交，眼见是受苦了。

文牍主义是我们党历来所反对的。早在建国前夕，毛泽东同志就把“讲话、演讲、写文章和写决议案，都应当简明扼要”作为党的一条工作方法提出来，1953年又在《解决“五条”问题》一文中强调指出：“滥发公文、滥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方法，必须坚决废止。”可惜我们有些